

# 以非遗保护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视野和战略思维,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局势,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个表述涵盖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5个方面的内容。在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从顶层架构设计上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诉求和担忧,为人类社会解“哪”来、现在在哪里、要到哪儿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应当也能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化多样性彰显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经济的共同体,更是文化的共同体。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的人适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创造了灿若星河、丰富多彩的文化成就。在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各国文化发展成果以彰显自身的独特性交相辉映、不断闪耀,全力展示了人类多样的创造力。

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文化多样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极为重要,与人类的整体命运息息相关。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优秀的文化成果交流互鉴、相互欣赏、共同繁荣,而不是相互歧视、相互冲突、相互消灭,才能使我们的世界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对文化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如今,保护和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主流价值观和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特别是2003年以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世界蓬勃兴起,其重要性得到各国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根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术品和文化空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隐藏着不同民族和群体的文化基因,是各民族、各群体独特性、文化多样性世代相传的当代表达。同时,各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护和动力。人们在促进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和平方面,往往都能从人类的古老智慧和经验总结中寻找解决方案。

然而,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强势文化不断主导,导致文化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在寻找“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的答案过程中渐渐迷失方向。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关全人类的发展,不能有人掉队或缺席。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认识不够,也或因受限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起步阶段,保护能力亟待提高。

提高全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促进不同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和欣赏,从而促进人类文明互鉴、相互了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有之义。开展国际合作,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从国际层面推动开展合作,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保护实践名册,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战略。

三、中国政府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应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以文明互鉴促进共同发展,尊重并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从一开始,中国就全面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起草谈判,为此提供中国智慧,并在2004年率先批准了这个公约。除了在国内

充分履行公约外,中国还积极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保护名册,成为少数几个同时有项目列入这三个名录名册的国家之一,列入名录名册项目总数达到31个,位居世界第一。另外中国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捐款,提出在中国设立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些充分说明,中国重视全球非遗保护国际合作机制,并愿意在此机制内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探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从机构设置、法规建设、理论探索、提高全社会保护意识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形成了“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保护方法。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10周年大会上,文化部原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管委会主席、时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的王文章同志提出,要总结、宣传和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认可和赞同。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中国经验,是中国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重要努力。

四、有关机构积极践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2012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在北京设立的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为亚太地区48个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能力建设和其他培训服务。这个中心的成立,既是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产物,也是中国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的成果。

中心成立近6年来,紧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战略,根据发展中国家优先的原则,先后为柬埔寨、萨摩亚、汤加、巴基斯坦、尼泊尔、蒙古国等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举办了28期培训班,直接受益人数达到900余人,有力地推动了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有关国家的高度赞扬。2017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02次会议批准该组织就此中心与中国政府续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新篇章,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叙事,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吹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号角。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则必将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贡献力量。

## 在文化自信基础上重建乡村文明

本报记者 张欣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当下,乡村建设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人文社科领域,对乡村生态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应有深层次的评估和理论探讨。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与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山东社科论坛“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知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对于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建设,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和中肯的建议。

### 乡村文化建设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建民提出要在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重建乡村文明,实现民众自身文化价值的体现和延续。

重新审视变动转型之中的中国乡村,在世界文化转型大背景下的乡村转型也迫在眉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旭东提出了乡村文化转型的依据与构想,他认为乡村文化治理必须要完成几个转型,即从文化生态转到文化心态;从文化实践转到文化自觉;从简单思维转到复杂思考;从节庆仪式转到文化记忆;从孤芳自赏转到大众创造。

通过乡村转型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益龙将转型中的现实乡土社会界定为“后乡土社会”。后乡土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发展出路问题,在现代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应该创新治理体制,迈向综合治理,与农村社区建设、管理有机统一,构建联动机制,广泛引入市场等社会力量参与,在政府、市场和社区之间形成良好的协作机制,激活三种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发展,帮助农民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

### 以艺术和教育强化乡村精神扶贫

在当下城市一体化的背景下,乡村成了人类未来发展最具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应该成为人类对未来思考和创造的一块有用之地。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方李莉基于自己的艺术学背景,提出了“艺术扶贫”的观点。她认为,当今乡村建设的目标不应局限于让乡村富起来,还要让乡村“美”起来、文艺起来,这就需要有新的创意、新的生活样式。要发现、重估、修复乡村的文化价值,在乡村文化的重建中,艺术家和人类学者要发出声音。

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教授李振峰基于自己长期的乡村教育背景,提出教育扶贫的观点,他认为应探索出一条适合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协同发展的新路,提出了乡村教育与乡村文

化的复兴之路构想,加强教育改革的改革,促进乡村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利用新的搬迁模式和市场力量应对乡村扶贫

对于日益空心化的乡村生态问题,专家从搬迁模式和力量等角度,为乡村扶贫出谋划策。

面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巫达以凉山彝族自治州部分村寨搬迁为例,从文化变迁角度剖析了该地区扶贫模式的正面效应,强调了乡俗乡规等文化因素的现实意义。

与政府行为的搬迁相对应,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提出了市场搬迁的概念,他建议要充分发掘资源优势、组织贫困农户;依托社会网络,发展消费者群体;启动城乡对接,开展产品配送;利用“线上线下”,进行城乡互动;创新多种机制,确保产品质量;去除中间环节,实现价格共赢。

在分组讨论阶段,专家还围绕“政府乡村治理角色”“乡村文脉重生”“手工艺传承”“地方戏曲与乡村文化复兴”“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村寨保护开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评议。与会专家关注了乡村治理过程中形形色色的问题,引导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有机对接;针对乡土文明传承日渐中断的局面,提出保护乡村环境措施,以艺术对接“乡愁”的畅想;针对乡村治理,提出了如何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诸多方案。

优良品德的同时,逐步强化和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即如何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品牌的规划与设计,将商业意识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将能为人类创造出更多更加优良的产品品牌贯穿于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之中。要想规划和设计具有独特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品牌,就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途径,走进市场、了解市场,这是培养学生商业意识最为直接和行之有效的途径。只有让学生走进市场,才能准确地了解市场的需求和把握市场动向,才能从市场需求中发现新的需求点,才能从市场需求中找到自己规划和设计的灵感,才能使自己所设计的产品品牌紧跟市场的需求。

在整个品牌规划与设计的过程中,从品牌的命名到品牌的商标设计,从产品的包装设计到品牌的实际识别系统设计,从各类媒介广告设计到品牌终端的卖场设计,无不与商业意识相关联。通过“品牌规划与设计”课程,学生能够经过一系列的训练,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和途径,最后完成自创品牌,并实现真实量产。

一个优秀的大学生,除了应该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商业设计意识,还应该具备创新创业的意识,更应该具备优良的品德。只有具备了商业意识和创新创业素养,才能设计出好的产品品牌来;具备了高尚的品德,才能创意出打动人的品牌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关心和爱护大学生,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

京剧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讲清楚京剧艺术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既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增强文化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好当代京剧的重要前提。

回望京剧近200年发展历史,像延绵不绝的山峦,总能看到几座矗立的高峰,它们象征着某个时代京剧艺术达到的高度,也引领了京剧未来发展的走向。这样的高峰,是具有标志性、里程碑式的杰出京剧艺术家铸造的。由近至远,首先是“十七年”时期的李少春。他是导演制、整体戏剧观逐渐定型的背景下,“开一代演剧新风”(朱文相语)的一面旗帜,对当代京剧舞台艺术影响深远。民国时期,角儿制成熟,古典的京剧艺术面临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梅兰芳,是流派艺术繁荣和京剧艺术从传统迈向现代、走向世界进程中的杰出代表。清末民初,“咸与维新”的社会思潮下,号称“梨园汤武”的谭鑫培是晚清京剧变革时期的一座丰碑。程长庚,则是京剧创始时期最为杰出的梨园领袖,内行尊为“大老板”,学者称之为“京剧鼻祖”。历史越久远,镜像越模糊,京剧初步形成之际,程长庚的历史贡献究竟如何,是我们探讨京剧史绕不开也必须弄清楚的话题。

众所周知,皮黄艺术起源于以安庆籍演员为主的徽班,自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皮黄声腔就正式入驻京城,但只有皮黄变成了京皮黄时,才算得上京剧的形成。在这脱胎换骨的蜕变中,皮黄艺人团体都做出了贡献,而程长庚个人的作用尤为突出。民国时期京剧史著作中,就有“言长庚,犹文家有韩欧,诗家有李杜,人人视为标准”(《梨园佳话》)、“适当京剧创成时代,率众山而成极峰,以为驾驭群雄之霸王,又终身主宰四大徽班之一之三庆班,现出罕见之事务才干,遂称彼为开山祖师与鼻祖也”(《京剧二百年之历史》)等等提法,但谈得笼统,仍有进一步予以明确的必要。个人认为,除了作为杰出的戏班组织者、管理者、创办科班培养众多名伶的教育者,程长庚还对皮黄艺术的规范、提升和开拓,推动京剧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一、对皮黄音韵的规范。声腔是剧种的核心要件,而戏曲声腔的本质是“依字行腔”,所以字音的调值和声韵又是声腔的决定因素。徽班自进京以后,就开始了“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的融合(这包括以皮黄为主体的各种声腔融合和音韵的融合),可皮黄声腔的规范并非一蹴而就,徽班艺人、汉调艺人以及以张二奎为代表的北方艺人在咬字发音上都带有乡音,从而在北京形成以地域为特色的早期皮黄流派。程长庚虽然是安庆人,但精于昆曲,他将昆曲念字发音的中州韵运用到皮黄中,精研调声运气之法,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念字发音方法,北京的皮黄音韵才建立起初步规范。在此基础上,程长庚运用他的天赋歌喉,嗓音高亢而不过沉雄之致,形成新的艺术风格。这对早期皮黄“时尚黄腔喊如雷”的质直平淡唱法有所改进,成为当时的典范,为孙菊仙、汪桂芬、谭鑫培后三鼎甲所继承和发扬。此后,谭鑫培继续将皮黄音韵的规范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京剧音韵才得以最后定型。

二、丰富提高了皮黄艺术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格。皮黄是起源于草野之间的乡土戏曲,早期以玩闹戏、风情小戏、武戏为主,虽然带有自然质朴的风格,但也比较浅陋、庸俗,所以和雅部的昆曲相区别而被称为“花部”“乱弹”。道光初叶开始出现一些篇幅较长的剧目,但题材上不出家庭伦理、男女情爱、武剧的窠臼,没有超越调谑、玩闹、喧嚣火炽的乡土戏曲特色。道光后期老生行崛起,开始丰富了皮黄艺术表现的题材内容。程长庚主持排演并主演了连台本戏《三国志》,还擅演《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浣纱记》等吴越春秋题材历史剧,这些剧目表现恢弘壮阔的历史故事,塑造影响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篇幅较长,在体裁上类似西方的正剧、悲剧。这些历史取材于民间广泛流行的历史演义,无论是叙事还是人物形象,在久远的流播中已经深深打上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印记。这使得皮黄艺术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呈现出更大的气象和格局。

三、提高了皮黄艺术的美学境界。据相关史料记载,程长庚反对演员站台的陋习,也不允许观众起哄叫好,他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所从事的艺术,以自己的声望来影响观众。效果是很明显的,《并伶传》说他:“独喜演古贤爱国,若诸葛亮、刘基之惨,则沉郁悲壮,四座悚然。乃至忠义英烈,泣下沾襟,座客无不流涕。”茶园里那些曾为小旦痴迷如醉的观众,此时折服于程长庚的艺术,情感受到深深的震撼,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让人感慨伟大艺术家对大众审美的引导作用。程长庚擅长扮演关羽、伍子胥、鲁肃、陈宫等人物形象,皆堂堂正正的英雄豪杰、伟岸大丈夫,他能将这些人物演得栩栩如生,加上唱腔慷慨质朴又沉雄自然,使得其艺术具有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美学特征,风格上颇类孟德之诗——“如燕赵老将,气韵沉雄”。这种有筋骨、有风骨的新的皮黄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梨园正音。这是皮黄成为京剧,并得以冠上“国剧”的最为重要的美学前提。

程长庚为京剧艺术的形成做出这样的贡献,是与其崇高的人格分不开的。他是古代社会身份低微的优伶,但他自尊自重,处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时代,时时抱有国家之忧。有史料记载,程长庚目睹咸同之际朝政日非、民众苦难深重,而诸贵人宴乐无休,不禁满腔忧愤,遂通过演剧言志。他说自己创作表现英雄豪杰、忠臣烈士的剧目是“泄吾愤耳”。由此可见,程长庚的艺术不仅是对当时现实的历史观照,也是其崇高人格的艺术化体现。舞台上,他急公好义,严于律己,与人交接有君子之风。可以说,程长庚是颇有儒者气象和文人情怀的一代伶圣。我们看他身处梨园而登号“四箴”,用的是远祖程颢“视、听、言、动”四箴的典故,这不正是不忘祖训的纪念、时时提携的自警吗?程长庚精湛的皮黄、昆曲艺术造诣,立身处世的儒者气象和文人情怀,造就了其一代宗师的地位,也通过其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影响到皮黄艺术的发展,推动了京剧艺术的正式形成。

从程长庚到谭鑫培、梅兰芳,再到李少春,我们回望京剧发展史上的高峰,也不难看到这些高峰不是孤立突起,而是在众峰簇拥中凸显出来的代表者。程长庚的历史功绩,离不开同时期余三胜、张二奎、梅巧玲、徐小香、胡喜禄等著名皮黄艺人包括观众群体的贡献。正如丹纳《艺术哲学》所说:“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伟大。”这些坐板式、里程碑式伟大艺术家,与同时期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大众的审美心理的关系,既有共振,也有引领。当我们回溯历史,缅怀程长庚在京剧草创时期艺术贡献时,更加迫切地期待契合时代精神并具有引领意义的新的艺术高峰的出现。

## 契合时代精神 引领大众审美

程长庚与京剧的形成

吴新苗